

海峡风云 48 年



刘 雄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1104585

海峡风云 48 年

刘 雄 著



201045859



福建人民出版社

海峡风云 48 年

HAIXIA FENGYUN 48 NIAN

刘 雄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350001)

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350003)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12.375 印张 239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1-02824-6

D·206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DHSS/27

22

人们都知道，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集团撤退到台湾地区以来，海峡两岸一直处于分离、对峙状态，至今还未能实现和解与统一。那么，两岸的这种分离与对峙状态是怎么来的？48年来，这种状况又是如何演变的？这段曲折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总结和吸取的经验与教训？两岸关系的发展现状究竟如何？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等等，这些都是当前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本书就是力图按照历史演变的进程，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与现实作一客观的描述与分析，并试图回答上述诸问题。

历史与现实表明，影响两岸关系演变与发展进程的因素，从大的方面来看，至少有这么三个：

(1) 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的演进，以及祖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

(2) 退到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的“大陆政策”的演进，以及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

(3) 国际形势，特别是以中美、中日关系为中心的远东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换句话说，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的历史背景下，决定海峡两岸关系变化发展的内因虽然还是前两种因素，但是我们决不能排除第三种因素，虽然它只是一种外部的因素。然而仅仅限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还是不够的。综观 48 年两岸关系的历史，以上三种因素往往是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有时，作为外因的第三种因素，由于美国在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时有其超级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作后盾，因此在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这种外在的因素时不时地转变为影响两岸关系进程的主导因素。这样一来，两岸关系的演变就显得更为复杂了。

按照上述分析，我感到，将 48 年的两岸关系划分为如下 6 个阶段，可能更为合理也更为客观些。

1949 年至 1950 年 6 月，是两岸政治、军事对峙格局尚待明朗的阶段。理由是：在这一时期，我军积极准备以武力解放台湾，以最终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而蒋介石集团退到台湾地区之后，惨败之余已军无斗志，加上美国权衡再三，决定“弃蒋”，以等待“中国的尘埃落定”再作决断。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若无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和美国对中国内政的横加干涉，一俟人民解放军备战完成，定会发起全面的攻台战役，国民党的失败将成定局。令人遗憾的是，朝战爆发后，由于形势的变化，我军不得不推迟台湾战役计划的实施，这样，即将明朗的两岸关系又一时无从明朗了。可以说，这一时期两岸间的政治、军事对峙格局处于即将被打破却又暂时没有打破的变动之中。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至1955年3月，是两岸政治、军事对峙格局初步形成的阶段。理由是：这一阶段，我军不得不集中力量“保家卫国”，加上有美国人在台湾海峡挡着，不得不暂停攻台战役，但仍未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与努力。1951年8月之后，随着朝鲜战局趋向稳定，中央即指示华东军区，着手实施对闽浙沿海之金门、马祖及大陈等蒋占岛屿采取行动，以解除其对沿海地区的威胁，并作为将来解放台湾的出发阵地。蒋介石则极力想趁朝战时机扩大事态，以借美国的力量实现“反攻大陆”。可以说，国共双方都着眼于打破军事、政治对峙的格局。但是美国为保护侵朝美军的侧翼安全，避免与中国两面开战和战争的复杂化，并永久侵占台湾，立即令其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且公然抛出了所谓“台湾中立化”及“台湾地位未定论”，既阻挡我军解放台湾，也反对台湾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此时的政策，就如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言，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而已。直到1955年3月，美蒋正式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的上述政策才以“法律约定”的形式得到明确。而正是美国这一侵略政策，在当时新中国还不够强大、蒋介石集团又得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了两岸的分离与对峙。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是两岸政治、军事对峙格局从不确定走向确定的初步形成时期。

1955年3月至1966年5月，是两岸政治、军事对峙格局的确定阶段。理由是：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真实意图是分裂中国的领土台湾，从而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以便其能永久控制台湾，使之成为美国

在远东“围堵”中国、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因而美国一开始就极力要蒋从沿海岛屿撤军，妄图将台澎地区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离开来，既便于美国上述图谋的实现，也可避免被蒋拖入与中国再次进行战争的危险之中。可是对蒋来说，占有沿海岛屿，不仅是其继续拥有中国其他省份“主权”的象征，而且也是它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和将来“反攻大陆”的跳板，因此便极力反对美国的撤军建议。同时，为维护其在台统治及其“法统”，蒋对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抱有极大的戒心，对美国“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图谋也极力进行抵制。为此，除了清除亲美势力以防患于未然之外，蒋还3次制造了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但皆遭我军的沉重打击，使其“武力反攻”的临战体制遭到破产，加上我“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攻势，蒋不得不放弃“武力反攻”的口号。到50年代末，转而提出“以政治为主，以军事为辅，主义为先锋，武力为后盾”的“政治反攻”政策。进入60年代后，则转向“以大陆为主战场，台湾为支战场”的所谓“长期反攻”政策。同一时期，正是根据美蒋矛盾的上述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于1955年后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主张通过谈判，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达至祖国的和平统一，并做出了将金、马继续留在蒋氏父子手上的决策。但是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加上美国根本不愿看到两岸的缓和与统一，蓄意加以阻挠和破坏，使两岸继续处于分离、对峙的状态，因此1965年之后，中央改而提出了“我们这一代只要播好种子”的新方针。这样，两岸的政治、军事对峙格局出现了新的局面。

1966年5月至1978年底，是两岸政治、军事对峙格局相对稳定的阶段。理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极左思潮与路线的错误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破坏，“一定要解放台湾”成了一句纯粹的政治口号。同一时期的蒋介石，虽也年年喊要“反攻复国”，但因其靠山——美国，这时正陷于越战的泥淖，且其全球霸权利益因苏联的扩张而日益受到威胁，因此不仅反对蒋的“反攻”，以免其与中国发生新的战争冲突，而且在对华政策上也开始酝酿新的调整。这样，靠自身力量无法实现“反攻”的蒋介石，其叫嚣也只能是一句纯粹的政治口号。10多年间，两岸除了以“空飘”、“海飘”、广播等形式进行“政治对抗”外，严格意义上的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双方的斗争转向了远离海峡地区的外交攻防。这样，两岸的政治、军事对峙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

1979年至1987年10月，是两岸关系从政治、军事对峙走向松动、缓和的阶段。理由是：这一阶段，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错误的极左路线，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在对台政策和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更加务实的态度，主动提出了通过国共两党的对等谈判，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实现两岸的直接“三通”，最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确主张。之后，邓小平同志更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此，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缓与发展两岸关系的具体措施，这一切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直接促进了两岸关系的缓和。对美

国而言，虽然它仍然继续推行“以台制华”的反动政策，不仅保留与台湾当局的“实质关系”，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迫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与台湾当局断绝了“外交关系”，且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的数量与质量，直至最终终止对台武器的出售。台湾当局基于其“法统”，加上有了美国“实质关系”作保证，顽固坚持“三不”政策，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和和平统一祖国方针的推动下，加上两岸同源同根和经济上存在着巨大的互补互利性，岛内各界人士纷纷要求返乡探亲，以及进行两岸经济、体育、文化交流。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不得不于1987年7月中旬，宣布解除台湾地区的军事“戒严令”，11月初宣布有限度开放台胞赴祖国大陆“探亲”，并在实际上放宽了两岸经贸往来的限制，等等。这样，延续38年之久的两岸政治、军事对峙开始走向松动与缓和。

1987年7月中旬至今，虽然两岸政治、军事对峙格局尚未解除，但两岸关系却有了一定程度发展，是为有限发展的阶段。理由是：这一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包括广大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两岸关系得到了缓和与发展。但是，蒋经国在其晚年虽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采取了“解严”、“探亲”等政策，但仍顽固地推行“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等不切实际的政策。李登辉上台后，又制定了所谓“国统纲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和平统一设置了种种人为障碍，特别是在其巩固了自

己的权势之后，更是把“一个中国”等原则逐渐抛诸脑后，执行以“对等的政治实体地位”及“务实外交”等旨在使两岸走向分离的“大陆政策”。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眼看中国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迅速崛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原先建立在“联华抗苏”之上的中美关系已失去利益基础，为称霸世界，转而推行遏制中国发展的反华政策，反映在台湾问题上，就是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并鼓励岛内的分离倾向，以达到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发展的目的。这样，两岸关系在总体走向缓和的过程中不时出现紧张局势，在发展的过程中时常出现曲折。

本书的总体结构，正是根据以上分段确定的。但是，考虑到两岸关系48年历史的核心内容是演变，只有把复杂的演变过程讲清楚说透彻，才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两岸关系的来龙去脉，才能揭示两岸关系的实质。因此在具体章节结构上，我把变化最为复杂的第二阶段和第五阶段各安排两章阐述，其他阶段都只安排1章。这样，全书共由8章构成。

众所周知，历史的联系永远是藕断丝连的，割断这种联系，只能否定历史，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和分裂势力，以及国际反华势力，极力割断这种历史的联系，为其分裂中国制造各种欺骗性的“理论依据”。为更准确地说明建国后两岸关系历史的演变，也为澄清各种“台独”谬论，很有必要对1949年10月以前的两岸关系的历史作一个简要的回顾。故而在主体章节之前，添加了“引言”部分。

此外，在理清与说明两岸关系这些年来历史演变的来龙

去脉之后，于主体章节外，又增写了“结束语”，力图对这一段历史作一个尝试性的总结，以便读者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和探索。

谁都知道，历史学之所以不同于文学，关键在于它来不得半点虚构。史料的翔实和分析的客观，这是书写历史的最基本要求，也是史学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而缓和与发展两岸关系、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事业，我们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也一再强调，中国的统一寄希望于两岸各族人民。因此书写两岸关系的历史，就不能以纯学术性的探讨方式使之局限于学术研究的小圈子，而应该使更多的人能看懂它、理解它、认识它，从而使更多的人对尽早实现祖国统一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产生更强烈的共鸣，自觉地共同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奋斗。因此，我在尊重历史事实与历史写作方法的前提下，力求以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来表述，做到雅俗共赏，既不偏离历史事实本身，又避免流于哗众取宠之俗。

不过，这些仅仅是我个人主观的想法与努力的目标，究竟能否达到，我确实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只能将评判权交给广大读者，真诚盼望大家在阅读之后能给我更多的宝贵意见。

刘 雄

写于本书出版之际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海峡两岸，一脉相承。

台湾著名史学家、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黄大受，对台湾高山族的“胶着语”、断发、纹身等语言、民俗，以及台湾古文化——圆山文化大岔坑遗址出土文物进行多年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高山族的主要族源乃是来自祖国大陆的古越人的一支。另一位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王炎教授，在对河姆渡文化遗址的文物，及河姆渡、定海、舟山、台湾和菲律宾等地共同发现的造船工具、出土文物进行科学比较研究后，也得出了祖国大陆古越先民曾渡海向台湾和南洋群岛迁移的历史结论。

这两位著名的史学家和其他众多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相互印证了祖国宝岛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同胞的祖先主要是来自祖国大陆的古越先民。

① 本引言参阅了《史记》、《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等部分篇目，以及连横的《台湾通史》、《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知识》、《中国历史》等书刊杂志。

关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可追溯到殷商时期，早在商代，殷人就已知道了台湾。战国初成书的《禹贡》一书，称台湾为“岛夷”。《史记》中的“瀛洲”、《后汉书》中的“东鯤”、《三国志》中的“夷州”和《隋书》中的“琉求”，都是当时的人们对台湾的称呼。这证明，远在两三千年的以前，我们的祖先对台湾就已有所了解。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于夷州，世世相传，有数万家。这是祖国大陆居民到台湾的最早传说。从秦汉以来，台湾就时有人到会稽郡，即今天的浙江省东南和福建省东北地区，进行“货布”等交易活动。而会稽东县人“海行”，也有遇风而飘流至台湾的。三国时的会稽太守沈莹，正是根据这些往来于两岸的人们的叙述留言，在他所著的《临海水上异物志》里，对台湾作了有史以来的首次文字记载，书中说：

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妇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藩障。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为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玉以作矢镞刀斧。环贯珠珰。饭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余丈，以着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

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食皆踞相对。凿床作器如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木槽贮之，用大竹筒长七寸许饮之。歌似大嗥，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去脑，馐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缺去前上一齿。

从这则记载看，台湾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后期。

两岸往来的最早记录始于三国时代。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记载，东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澶州。澶州在海中，……所在绝远，率不可得至”，他们只得无功而返，不久即被孙权所杀。为何孙权要派如此大规模的军队浮海求夷州呢？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孙权“远规夷州”的目的是为了“以定大事”，也就是想在台湾建立根据地，以便和曹魏、蜀汉争夺天下。这说明，从东汉末年始，随着中原居民的南迁及南方的开发，台湾的战略地位已引起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到了隋朝，朱宽、陈稜等人先后到达台湾，虽然也无人留下来，但陈稜却带回50多户台湾移民，定居于今天福建省福清市东南的郭庐山（现名福庐山），陈稜因此被后世奉祀为台湾的“开山祖”。

宋、元之后，大陆居民开始有意识地移居台、澎地区。宋朝时，因泉州的移民大量定居于澎湖列岛，在那里建造了200多间房屋，“编户甚繁”，宋代地方政府便将澎湖划归福建晋

江县管辖，还在岛上驻扎军队。到元朝至元二十九年至至元三十一年间（1292~1294年），正式在此设立巡检司，隶属晋江县，开始在那里征收盐课。从明代始，祖国大陆居民开始大量移居台湾本岛。明末，郑芝龙等占据台湾，并在岛上设置了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还招引了大批祖国大陆居民有计划有目的地移居台湾。因此在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之前，一个荷兰船长到达台湾大员附近时，便看到“有些中国人定居在这里，经营商业”。历史事实表明，早在外国殖民者染指台湾之前，祖国大陆的汉族居民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生产，而且开始推行行政管理和开发等措施。

1661年4月间，明朝“延平郡王”郑成功率军2.5万人，战船100多艘，为收复祖国的宝岛，建立“反清复明”的基地，渡海东征。郑成功的军队将荷兰殖民者筑据的赤嵌城紧紧包围，并向荷兰侵略军头目揆一发出最后通牒，严正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予既来索，则地当归我。”最后，郑成功军队在台湾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终于迫使荷兰殖民者于1662年2月1日^①投降，狼狈退出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各族人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此后，立台湾为“东都”，设承天府，置天兴、万年两县，并通令奖励农业、发展水利，还发给高山族同胞耕牛、铁农具等，向他们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这一系列措施，促使台湾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

^① 郑荷和约的签订日期，另有一说为2月10日。见张英：《郑荷和约签订日期之考订及郑成功复台之战概述》，载《台湾文献》，第18卷，第3期。

进步。

1683年，清政府为结束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的统一，命将军施琅进攻台湾，郑克塽归降。次年5月27日，清政府在那里设立了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诸罗、凤山3县，并设立台湾府学和台湾、凤山县学。到清光绪元年（1875年），为加强台湾的行政管理，改而分设台湾、台北2府，改淡水厅为新竹县、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还新设了卑南厅、恒春县和淡水县。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东南海防，将台湾道升格为台湾省，下辖台北、台湾、台南3府，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遂在全省推行洋务运动，筑铁路、办邮政、设航运、开矿山、建工厂，推动了台湾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据史载，台湾“商民既多乐赴，绅士绝无异辞”。

甲午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卖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从此，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达50年的残酷殖民统治。1942年，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上一致决定将台澎归还中国，随后的《波茨坦公告》再次重申了这一决定。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当中国政府任命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前往接受日本投降之时，台湾各族人民吹呼雀跃，激动得热泪盈眶。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台湾各族人民有着中华民族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优秀传统，他们与祖国大陆人民一道，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前仆后继，英勇顽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轰轰烈烈

的驱逐、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中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可歌可泣的爱国壮歌。

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大股倭寇侵入台湾鸡笼（今基隆）一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激起了当地人民的顽强反抗，被迫退去。万历二十年（1592年），倭寇再犯鸡笼、淡水等地，在台湾军队的坚决抗击下，惨败溃退。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日本幕府政权开始变本加厉地侵略台湾。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603年1月19日），明朝政府即派福建浯屿将军沈有容率师往剿，明军将士作“殊死战”，全歼倭船6艘，斩首15级，救回男妇370余人。高山族人民“扶老携幼，竟以壶浆、生鹿来犒王师”。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日本山田长正率众企图侵犯基隆等地，明政府立即增设澎湖“游兵”，在鸡笼、淡水屯驻军队。山田长正慑于明军威势，被迫退走。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统治者德川家康派遣有马晴信率兵侵扰台、澎，遭到当地居民的坚决抵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德川家康又派村山统领船舰13艘、3000余人入侵金门料罗，攻占台湾竹塹港（今新竹），在当地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狼狈溃逃。崇祯元年（1628年），日人滨田弥兵卫率亡命之徒484人阴谋占据台湾，再遭惨败。

进入17世纪后，西方殖民者相继东来，争夺殖民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7月，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殖民者派韦麻郎率军舰2艘、1200多人，勾结奸商，首侵澎湖，明政府的爱国官吏即对澎湖实行经济封锁，拘禁奸商，“严守要害”，“厉兵拭甲”，并遣都司沈有容率兵到澎湖，荷兰殖民者被迫扬帆而遁。天启二年（1622年）6月，荷兰殖